

西方

非正统经济学译丛

〔美〕托尔斯坦·凡勃伦 著

科学
在现代文明中的
地位

 商务印书馆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05539-0



9 787100 055390 >

定价: 26.00元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

科学在现代文明 中的地位 及其他论文

〔美〕托尔斯坦·凡勃伦 著

张林 张天龙 译

徐颖莉 校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美]凡勃伦著;张林,
张天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
ISBN 978-7-100-05539-0

I. 科… II. ①凡…②张…③张… III. 经济学—方法论
IV. F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965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

[美] 托尔斯坦·凡勃伦 著

张林 张天龙 译

徐颖莉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539-0

2008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

定价: 26.00 元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

编 委 会

顾问： 胡代光 高鸿业 吴易风

主编： 张林

编委： 施本植 张荐华 徐光远 杨先明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

总 序

在西方正统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翻译出版非正统经济学著作,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而我们认为,对非正统经济学著作的译介,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完整地理解西方经济学,认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缺陷。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努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终于面世。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丰富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库,丰富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

“非正统”(heterodoxy)一词常译为“异端”。我们在这里选用中性词义的“非正统”一词,^①而不用略带贬义的“异端”一词,表明我们并未将本套丛书收录的著作视为“邪说”。相反,这些著作都是一个学派的经典,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我们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与“非正统”理解为对待现存经济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那些维护这个体制的经济学说便是正统学说,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就是正统经济学的代表。反之,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的学说,就属于非正统经济学。由于非正统经

^① 我们本打算使用“反正统”一词。感谢高鸿业教授的建议,他认为丛书所含著作的理论并未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完全对立,因而用“非正统”更为恰当。

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因而也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反对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属于非正统经济学。与“正统”和“非正统”相联系的,还有“主流”和“非主流”这两个词。我们认为后者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时期,非正统经济学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比如 20 世纪前 30 年的美国制度主义。同样,正统学说也不一定是主流,比如奥地利学派。

非正统经济学的两个特点是我们翻译这套丛书的主要动因。第一,非正统经济学对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持批评态度,从而对作为这个体制的意识形态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同样持批评态度。非正统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其方法和范围,针对根本,针针见血。这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缺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非正统经济学令人信服的批评,有助于消除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盛行的盲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这一不良倾向。第二,非正统经济学大多能够紧密联系当时当地的经济现实,从剖析现实的角度而不是从维护某种理论的角度阐述理论。今日中国尤其需要适应国情的经济学说。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这种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近年来,西方正统经济学译著比比皆是,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译介显得势单力薄,而且缺乏系统性。我们翻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重要文献的系统介绍,将非正统经济学的全貌和最新研究成果展示给国人,为更多人参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打好文献基础。我们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一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派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条件成熟后,我们还将系统译介其他非正统学派的文献。

制度主义发端于美国,是美国原生的经济学派。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大多停留在其创始阶段,对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

发展比较陌生。

制度主义在 20 世纪前 30 年曾风靡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沉寂后,制度主义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复兴,并形成了以凡勃伦—艾尔斯传统(Veblen - Ayres tradition)为理论主体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新制度主义者于 1965 年组建了自己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并于 1967 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在 J. 法格·福斯特(J. Fagg Foster)、马克·图尔(Marc Tool)、保罗·布什(Paul Bush)、威廉·达格尔(William Dugger)等人的努力下,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艾尔斯(Clarence Ayres)的理论为基础,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今天活跃在欧美经济学界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制度主义还为其他学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比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诸多理论问题上从制度主义的学说中吸收了营养,近年来兴起的演化经济学也将制度主义视为自己的源泉之一。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制度主义这一重要的非正统学派的了解远远不够,甚至对它产生了诸多误解。^① 本套丛书汇集了制度主义各时期的代表作,力图反映制度主义的全貌及其新发展。

这套丛书得以面世,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②、吴易风教授,他们对丛书的选题和翻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和无私的帮助。

① 其中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几乎把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视为新制度主义的惟一代表。

② 正当丛书即将面世之时,噩耗传来:高鸿业先生不幸逝世。就用这套丛书来表达我们对高先生的深切怀念吧。

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们有勇气和条件完成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丛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和发展研究院的教师承担,我们也要感谢两个学院提供的大力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张胜纪先生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人的翻译水平令我们肃然起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最后,我们要对商务印书馆在扶持学术“冷门”、关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方面表现出的远见卓识表示崇高的敬意。

丛书编委会

2007年6月

译 序

凡勃伦以行文晦涩、善造新词而著称。我们在本书的翻译中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使文字接近中文的习惯表达方式,但仍感不尽如人意,恐读者难以理解,加之凡勃伦的理论和观点并非大家耳熟能详,因而有必要在此对本书所录论文的主要观点作一简介。

在本书的开篇论文“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凡勃伦质疑科学在现代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凡勃伦认为,在现代文明中,人们把科学抬高到“神灵园囿中的生命之树”、“神灵房舍中的闪电之光”的地位,盲目崇拜。现代文明以及现代科学的特征是注重实际,是功利性、目的论的。但在人类发展史上,科学或者知识却并非如此。

凡勃伦在本文中历史地考察了科学或者知识的进化。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未开化时代、野蛮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过程时代(亦即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在不同时代,人类的不同本能顺应流行的思想习惯(也就是凡勃伦所定义的制度)而主导着知识的进化。凡勃伦把人类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 bent*),后者包括竞赛(*emulation*)、掠夺(*predation*)和运动本能(*sporting instinct*)。^① 在未开化时代,人类对知识的寻求

^① 关于凡勃伦的历史阶段论和本能理论,详见他1914年的著作《劳作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重印。

主要受随意的好奇心的支配。随意的好奇心是一种不带功利性地探求知识、认识世界的本能,也是人类知识的根本来源。它不求有用,但求知识的积累。随着“有用”、“实用”这一类标准在后来的时代成为支配性的思想习惯,随意的好奇心所产生的知识就要由其是否实用来加以筛选。于是,注重实际的知识和科学以及它们的分析方法和推理方法——“对事物晦涩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实质性的核心”,甚至在那些“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领域里刻意地拼命使用科学阐述”,产生了“诸如基督教科学、‘科学的’占星术、‘科学的’手相术等等之类的东西”。这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桎梏。科学的这种特性在现代尤为明显,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习惯(制度)强化了这种注重实际的倾向。“只要机器过程作为现代文化中的一个规律性因素继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这个文化时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就肯定会保持着机器过程赋予它的特征。”

面对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这种地位,并非人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接受。“具有遗传特征的正常人在它的控制下并不安分。”凡勃伦就属于这种不安分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寻求颠覆那种支配性的思想习惯。

读者在阅读本文时要特别注意凡勃伦对“实用的”(pragmatic)、“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些词的使用,与我们平常的理解并不一致。请参阅正文中的该文注释。尽管凡勃伦在注释中强调了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些词,但实际上他在行文时并非始终坚持某种用法。在有些地方需要读者联系文意去理解。

“科学观点的进化”可以视为前文的延续。在本文中,凡勃伦的目的就是要更详细地考察思想习惯(在本文中他更多地使用的是“先人之见”这个词)如何影响科学观点的进化。凡勃伦区分了“前达尔文主义”科学和“后达尔文主义”科学。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

视为科学的新纪元的开端。此前的科学是“前达尔文主义”的,其特征是“定义和分类”。这类科学关心的是事物将要达到的“完满状态”,关心的是“产生事物的假定的初始稳定均衡中事物是怎样的,以及事物在稳定的最终状态中又应该是怎样的”。而“后达尔文主义”科学“根本性的假定是具有逻辑连续性的变迁”,关心的是“因果过程以及初始原因和最终结果之间不稳定的间隔和转换”。这种科学的考察“在任何方向上都不会有终点”。这也正是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进化的特征。基于这种划分,凡勃伦才在后一篇文章里认为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

科学观点之所以从“前达尔文主义”科学向“后达尔文主义”科学转变,是因为共同体的思想习惯的转变。“科学和科学观点将会明显地随着那些……流行的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这篇文章论述的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科学观点的转变过程。

“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是凡勃伦的一篇著名论文,常为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者所引用,集中体现了凡勃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评。正统经济学关心的是一个确定的原因导致一个确定的结果(均衡)这种保持着良好的一致性的因果关系,关心的是一种常态。它的心理学基础是快乐主义心理学。^①“快乐主义关于人的观念是把他当做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同质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进化经济学则不然。它关心的是累积性因果关系,探讨的是一个发展过程,它研究的个人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主动的个人。“一种进化的经济学一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

① 我们把 hedonism 一词译为“快乐主义”而不是通常采用的译名“享乐主义”,因为这种心理学强调的是人的行为是由快乐与痛苦的对比来决定,它强调的重点不是“享受”、“享乐”这样的意义。

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一定是一种由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的累积性序列理论。”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一个宣言,它宣告了凡勃伦开创的制度经济学将是一门进化科学。

1899~1900年分三次发表的长文“经济学的先入之见”是凡勃伦对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的一个系统回顾和批评,也是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一篇经典论文。文中,凡勃伦通过思想史的梳理来证明“特定一代经济学家的精神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通行的观念和先入之见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结果”。

重农学派是文章第一部分的主题。由于“重农学派的思想一般被视为是对与后来的理论相一致的经济理论的第一次清晰而全面的陈述”,凡勃伦将其作为本文论述的起点。他的结论是,控制重农主义者思想的先入之见是自然法。自然法是启蒙时代法国社会的“常识性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自然法为目的论的,其特征是“导向一个目的、实现一个目标的一种倾向”。凡勃伦在文中历史地、详细地考察了自然法先入之见是如何形成的。

文章的第二部分以亚当·斯密和功利主义哲学为主展开论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同样是自然法先入之见的体现。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上帝所设计的服务于人类福利的自然秩序。斯密在自然法的目的论含义中增加了连续性的因素,即事物通向完美状态的过程是连续的,即使出现偏差和差错,事物也会自我纠正。这个过程的有效因素是被标准化的人性,它适应快乐主义含义的自然秩序的要求。这种人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生产中对效率的追求、交换中对金钱利益的追求。斯密之后,这种“经济人”得到功利主义哲学以及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的标准化。功利主义与斯密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质性的经济学基础是快乐与痛苦:目的论秩序……是实现这种基础的方法”。大规模进入经济理论的

功利主义的影响表现在古典经济学家“最为严肃地关注的是生活的金钱方面”，这使得经济学家“将交换价值而不是将有益于社会物质福利的生产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特征”，凡勃伦在这里其实为我们揭示了边际革命的方法论基础，尽管他没有提及边际革命。

尽管在进化观念(同样是一种先入之见)的影响下，后来的经济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古典经济学，这是文章第三部分的主题。虽然约翰·穆勒从有差别的人类动机推导出有差别的人类行为，从而说明自由放任不是惟一的选择，虽然凯尔恩斯完成了对巴师夏信条的颠覆，虽然老凯恩斯在分析中更多地关注了历史和制度，虽然马歇尔的思想具有了进化论的色彩，但是，自然秩序并没有被彻底地清除。自然秩序变成了“常规”，自然法观念变成了“常态”观念。经济学家所揭示的经济法则是“调节均衡的经济活动的法则，……它们是把人们生活中的活动所追求的其他利益限定为经济(一般来说是金钱)利益的定理，而不是关于经济利益在创造一般的生活体系时采取的方式和影响程度的定理。……它们是守恒的法则和选择的法则，而不是演变的法则和扩散的法则”。一句话，这样的经济学是前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而不是进化的经济学。

值得一提的是，凡勃伦在本文第三部分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一词，这是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这种提法。

克拉克是美国经济学的代表，通常将他视为边际革命的完成者。但是，凡勃伦在“克拉克教授的经济学”一文中，通过对克拉克理论体系的完整评价，尤其是对他的分配理论的剖析，认为克拉克仍然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与同时代的那些竭力支持边际效用学说的人不同，克拉克先生确实是古典学派的代表。”那是因为一方面，他的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是快乐主义，他“把所有现象都简化为‘正常的’、‘自然

的’、建立在快乐主义的计算基础上的生活体系”。另一方面,尽管克拉克强调动态研究,但他仍然满足于探讨数量的变化,“没有注意到数量以外的变化”,也就是没有像达尔文主义那样去考察累积性的变化。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凡勃伦把整个西方正统经济学都视为“前达尔文主义”的科学。也就是说,正统经济学在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也没有完成向进化经济学的转变。

“边际效用理论的局限”是凡勃伦为数不多的批评边际革命成果的论文。凡勃伦把边际效用理论视为研究给定制度条件下价值的分配的学说,其核心是快乐主义的计算。这种学说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只不过“边际效用学派被限定在一个更狭隘的范围内”。边际效用理论不研究约束行为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去考察人类活动,这“只会得到静态的结果”。文中,凡勃伦还批评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并阐述了自己的制度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正统经济学没能向进化经济学转变,那么非正统的历史学派是否完成了这种转变呢?“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凡勃伦高度评价了旧历史学派的方法,但认为它缺乏理论。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以建立一套一般性的理论为目标,而且他的著作中确实“集中分析的是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制度的起源、发展、持续和变化”,因而他的著作的优点“在于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后达尔文主义的、因果关系的理论”。但是,施穆勒在很多时候仍然只是像旧历史学派那样满足于数据的处理,而且更重要的是,施穆勒把当前的制度形式当做一种最终的结果。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进化是没有终点的“盲目漂移”。在这里,施穆勒已然不再是从进化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总而言之,凡勃伦认为施穆勒的著作向进化经济学迈出了一大步,但仍不足以使经济学成为进化科学。

“生产的职业和金钱的职业”^①一文集中体现了凡勃伦的认识论基础,即“凡勃伦二分法”(Veblenian dichotomy)。凡勃伦把社会划分为进步的技术体系和保守的制度体系两个组成部分。制度体系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选择相应的技术,使技术的发展不至于破坏现存的制度结构;技术体系不断试图突破制度的约束,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对“技术—制度”(或者工具—仪式)的划分贯穿其理论始终,也是他的制度理论的核心。与技术—制度二分法相应的是各种对立的概念:工业和商业、生产的和金钱的、有用的和无用的、普通大众和既得利益者等等。“生产的职业和金钱的职业”正是探讨以产品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和以金钱所得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明确了金钱活动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是现存经济体系的特征。同样,分两部分发表的“论资本的性质”一文是对这种二分法的运用。文中凡勃伦明确了以生产为目的的资本品和以所有权收益为目的的资本之间的区别及其各自的作用。

文集中收录了凡勃伦论及社会主义理论的两篇文章。“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些被忽视的观点”是凡勃伦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892年),文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当时林林总总以“社会主义”为名的社会改良主张,凡勃伦针对的是斯宾塞的观点。在凡勃伦看来,社会主义理论对当时社会不公和普遍的不满情绪的解决方案忽视了一个内容,那就是社会不公和不满情绪的起因。他认为起因在于人类的竞赛本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赛本能驱使人们追求金钱利益,因为占有金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观点在他后来的名著《有闲阶级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分两部分发表的“卡

① 我们在多数地方把原文中的 industrial 译为“生产的”。凡勃伦是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 industry 和 business 这两个词的。前者的含义是从物质生产的活动,后者则指的是那些以金钱上的收益为目的的活动。

尔·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凡勃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系统评述。我们不妨将其当做一家之言,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激进思想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文集还收录了凡勃伦晚年发表的两篇论人种问题的论文“突变理论与白种人”与“白种人与雅利安文化”。文中,凡勃伦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欧洲白种人的来源。编者之所以将这两篇文章收入文集,目的不仅仅是表明凡勃伦的博学。凡勃伦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时候(1913、1914年),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已开始抬头。针对种族优越论,凡勃伦阐明所谓的优等种族(白种人和雅利安人)都是人种杂交和突变的结果。

最后一篇文章“托拉斯的早期实践”叙述的是10世纪北欧海盗们组成的“垄断企业”,既可视为他的名著《企业论》的一个注释,也可视为他的寻根之作。当时的正统经济学开始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或者进取精神),但凡勃伦认为这种进取精神只不过是人类掠夺本能的体现。凡勃伦是挪威移民的后代。他在晚年甚至用挪威语写作传奇文学。本文大量从北欧传奇文学中寻找例证,似乎为他晚年的离奇之举作好了铺垫。

本书前10篇和后3篇论文由张林翻译,其余5篇论文由张天龙翻译,由徐颖莉统校全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在此致谢。我们也为生于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而感庆幸。凡勃伦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文中出现了大量生僻的语言,比如古英语、古德语、挪威语、拉丁语,远远超出了译者的知识范围,给翻译工作带来了莫大的困难。通过网络求助,这些困难一一化解。在此对那些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不知道真实姓名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有限,译文难免不尽如人意,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林